

江蘇黨史資料

第二輯

JIANGSU DANGSHI ZILIAO

1988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
江蘇省檔案局 編

内 部 资 料
注 意 保 存

江 苏 党 史 资 料

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总第27期）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江 苏 省 档 案 局

登记机关：江苏省新闻出版局
内部期刊准印证 JS 3336

聯抗軍民在黨
 領導下執行抗
 日民族統一戰
 線堅持敵後根
 根據地鬥爭作
 出了重要貢獻！

陳丕顯

一九八七年
四月



607-7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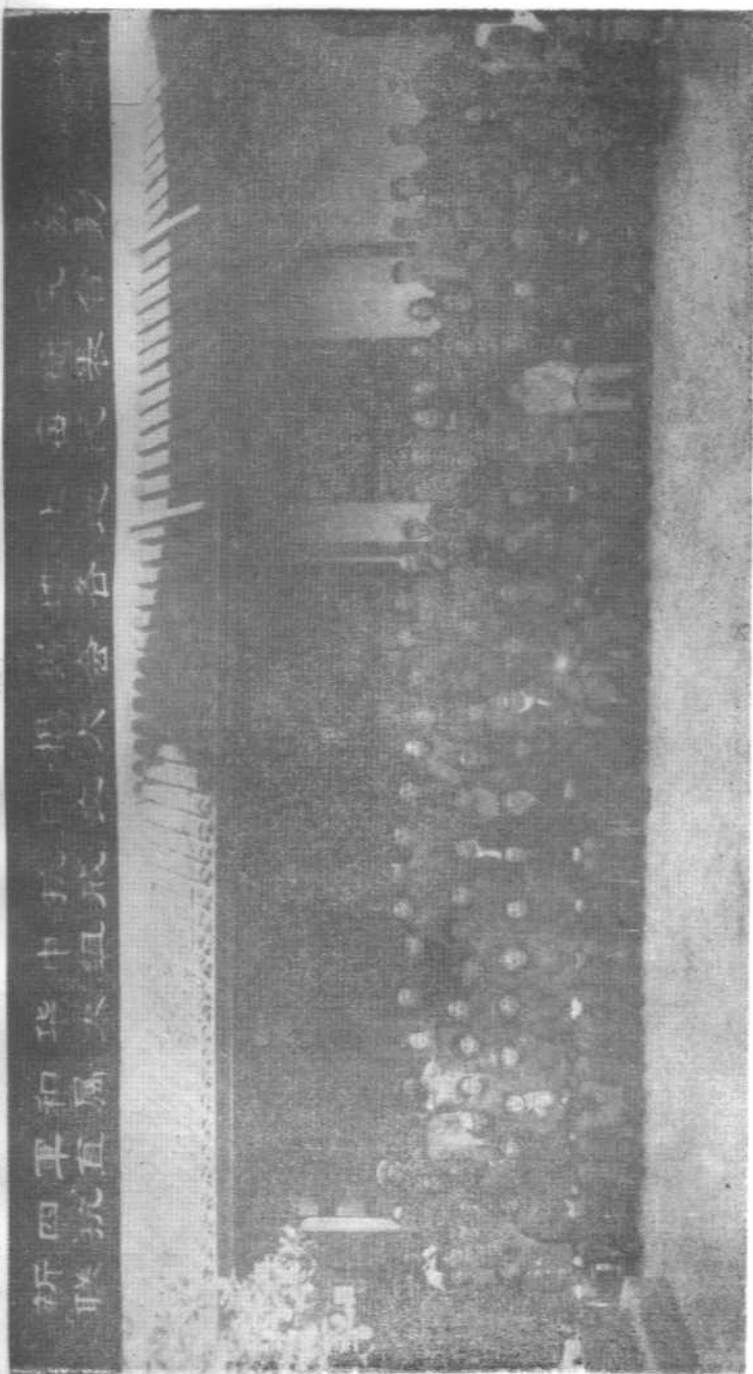
▼海安县「联抗烈士陵园」外景

▲新四军联抗部队烈士纪念碑铭

新四军联抗部队烈士纪念碑铭

新四军联抗部队烈士纪念碑铭
 联抗部队自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值此纪念碑落成之际，特将烈士姓名刻于碑上，以资纪念。
 烈士姓名：（此处为烈士姓名列表，因文字较小，部分难以辨认，但可见有“王”、“李”、“张”等姓氏）
 纪念碑位于海安县联抗烈士陵园内，由新四军联抗部队烈士家属及当地群众共同捐建。纪念碑高约十米，呈拱形，顶部有五角星，象征革命精神永存。





▲联抗部分老同志合影

江 苏 党 史 资 料

一九八八年第二辑(总第二十七辑)

目 录

· 联抗史料汇编 ·

联抗部队的四年(代序)…………… 黄逸峰(1)

联抗史略…………… (13)

联抗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线中的作用…………… (46)

联抗(兴东泰)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和群众工作…………… (73)

联抗部队的军事斗争和建设…………… (97)

联抗(兴东泰)地区的政权建设…………… (117)

联抗部队及兴东泰地区大事记…………… (139)

有关联抗的报刊资料…………… (171)

附录七则…………… (232)

编后…………… (235)

(联抗史料由苏中抗日斗争史料编写组联抗兴东泰小组编写)

· 党 史 专 题 ·

新四军与“二李”交往始末……………黄家骏 (237)

反清乡前后我党在镇江佛教界的统战工作

……………钱 凯 李 斌 (244)

联抗部队的 四年(代序)

黄逸峰

(一)

1940年10月10日，在苏北泰县的曲塘镇，有一支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这儿宣布成立。从战士们的



臂章图案——鲜红的火炬上面衬托出的“联抗”两字看来，这是一支联合抗日的部队，“联抗”就是这支部队番号的简称^①。

人们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部队的诞生，有些人还在相互询问：为什么抗战已经三年有余，忽然在这里成立起这支部队？组织这支部队的首脑人物，又都是素不知兵的文人，来参加的部队很多是有组织的武装，有从新四军来的，有从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来的，有从税警团来的，有从保安旅来的，还有从地方保安部队改编过来的，也有很多青年学生来参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集中了官兵千余人，这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

联抗部队的建立，是和苏北抗日军事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分不开的。1939年——1940年间，由于江南的新四军进入苏

^①“联抗”全称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

北，东进抗日，使苏北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著名的黄桥战斗，就是造成形势变化的决定因素。黄桥战斗的结果：新四军依靠广大人民，消灭了以韩德勤、李守维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和一部分保安旅，基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在苏北长期以来不抗日只扰民的统治；韩德勤率残部困守兴化。实际上新四军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了苏北，为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较为巩固的基础。但这时候，在沿长江和里下河一带，仍驻有一部分国民党非嫡系部队，这些部队没有积极参加韩德勤对新四军的进攻，有的还曾经向新四军表示过中立和友好的态度，如李明扬部，税警团陈泰运部和少数保安旅，大约还有三四万人。这些部队在韩德勤部大部主力被消灭后，纵然新四军坚持实践团结友军抗日的诺言，但他们还是有些担心，希望新四军和他们驻地之间，能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驻一支他们能够信任的部队。谁是他们所信任的？既不是新四军，也不是指他们自己。我党为了在这样一个各种武装势力并存和斗争错综复杂的地区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巩固既得的胜利，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将尽可能多的力量团结到抗日的队伍中来，并尽量将潜在的敌对势力转化为友军，共同抗日，所以，同意建立这样一支部队。这是我党根据当时当地的形势，灵活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我和李俊民被指定为这支部队的组织者。当时，我感到自己是个文人，怕不能胜任军事指挥员的职务，心中不免忐忑不安。陈毅鼓励我说：“既然三方面都支持你，你借此收容顽军残余势力，是可以建立起一支军队的。至于不会打仗，可以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嘛，我们的军事干部大部分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打消了顾虑，鼓足了勇气，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曲塘镇设立了

司令部，并成立了学兵团和文工团，部队分驻曲塘、白米一带。这就是联抗部队的来历。

联抗军驻扎的地区，1939年党就建立了秘密组织，发动和领导了民众抗日运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联抗军建立后，党先后派张敬人、卢涛、张孤梅、贺敏学、吴光明、彭柏山、魏翹南、戴为然、顾复生、邱玉权、姜茂生等来部队，加强了党对部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并在联抗军内设立了民运部，民运部下设秘工部，负责对日伪顽地区的秘密工作。在这些地区，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情报网、交通线，控制了一些伪顽区乡政权。联抗军公开活动的范围，虽只有曲(塘)北、海(安)北两区，但它秘密活动的范围，则包括整个兴(化)南、泰(州)北、东台西部的水网地区。

联抗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筹备苏北抗敌和平会议。这次和平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在黄桥战斗胜利之后，加强对苏北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地方上层的抗日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他们一同抗日。参加这次和平会议的不仅包括那些表示中立的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也包括韩德勤系统在内的代表，同时也邀集了当地的开明士绅。这样做，在战略上可以取得优势和主动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提高我党和新四军的威信，使人民相信我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真诚的，只是在顽固派的进攻下，我们才被迫采取自卫反击的。这次会议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新四军直接提出，通过联抗进行联系和组织的，并确定以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为开会地点。会议在1940年10月底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新四军的代表陈毅司令员，有八路军的代表，有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总指挥，税警团和一部分保安旅的代表，地方士绅韩紫石的代表和朱履先先生等。韩德勤的代表马

某临时宣布不出席。这是有名的曲塘会议。联抗以中立地位作为东道主。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苏北各部队联合抗日的通电，各方面交换了意见，进一步巩固了新四军在苏北的领导地位，也稳定了这些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的军心，当然韩德勤是更加孤立了。同时，在苏北军民的心目中，联抗管辖的地区成为公认的中立区，联抗是国民党部队同新四军合作的桥梁。

(二)

1941年2月，泰州李长江率部投敌，新四军决定讨伐。在陈毅、粟裕正副司令指挥下，联抗部队参加了战斗。首先参加解放马沟和姜堰的战斗；接着，又奉命在胡家集、曲塘一线阻击如皋方面来支援李长江的日军，以争取时间彻底消灭李长江投敌部队。这两次战斗，联抗虽然有些伤亡，但对于部队是很好的锻炼，在群众中也有良好的政治影响。李长江率部投敌后，日军完全控制了里下河一带，泰州、东台、兴化和海安等城镇均告沦陷，曲塘、白米均成为伪军的据点。联抗部队转入农村，同当地人民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学习反“扫荡”，打游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当时主要活动的地带是曲塘、白米以北地区。虽然部队在战斗中逐步地成长，但由于部队尚未完全巩固就投入了战斗，加之由城镇转入农村，不少官兵过不了那种流动性较大、物质条件较艰苦的战斗生活，因而发生官兵逃亡的现象。这时，关于建军的路线问题，已摆在我们面前，象这样复杂的队伍，其成员有国民党，有农民，有地主、富农及其子弟，还有旧军官、老兵痞等等。究竟要把他们组成一支怎样的部队？党的方针是明确的，必须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逐步把它改造成为工人、

农民和爱国人民的抗日武装，但为了便于进行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应尽可能用国民党的番号，暂时保持我党外围军的形式。这样，就产生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以及部队中各种不同阶级成分之间的斗争，特别表现在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生活待遇问题等各个方面。那些从旧军队带来的军阀主义作风，妨碍了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生活上怕艰苦，要求舒服，缺乏严格的纪律，特别是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弟，对于发动群众，实行党的二五减租政策有抵触情绪；在阶级路线上，不愿意依靠农民而倾向依靠地富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建军中的思想障碍。这些矛盾与斗争，集中表现为官兵的逃亡，从而使我们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产生了困难。要把这个部队逐步改造成为党所要求的那样，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和艰苦耐心的教育，但是在敌伪频繁“扫荡”、同敌伪据点又很接近的狭小地区中进行改造工作是有困难的。由于上述原因，奉新四军军部命令，我们暂时调离该地区，去军部附近进行训练和补充。1941年7月间，我们留下少数部队和干部坚持原地区的斗争，大部北上。这次北上对我们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长途行军对很多人员是不习惯的，又正碰上日伪对盐阜地区的大“扫荡”，军部已转移。有一天我们行军一百三十里之后，在湖垛附近的桥头镇，与敌遭遇，并被包围了。由于部队中党的领导和党员骨干对敌斗争坚决，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战斗，终于大部突出了重围。但在这次战斗中打散了数百人，一个新参加的独立支队支队长黄重厚在渡河时牺牲了。部队虽然遭到一定损失，但经过战斗后，部队更加团结了，反而减少了逃亡现象。在高作休整时，奉军部骑兵通信员传来的命令，我部继续北进，在阜宁的朦胧、硕家集一带与新四军军部会合。在军部

直接指挥下，还配合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参加了反“扫荡”战斗。在坚守硕家集的战斗中，我部损失了一个连。以后即随军部活动于老黄河两侧，担任军部的警卫任务。反“扫荡”胜利结束后，在阜宁的洲门镇，整训了两个月，加强配备了军政干部，准备重新打回原地区。这时候，部队在数量上是大大减少了，官兵只剩下七百八十人，约为原有人数的一半，但战斗力却大大地加强了。大家都有坚持原地区斗争的信心和决心，确实已是一支党的部队了，只是仍然保持着外围军的形式。出发前，陈毅军长亲自向我们作了指示和布置了工作，并对全体官兵说：回去大家都是高兴的，但要有思想准备，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你们虽然名义上不是新四军，但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要以新四军的标准来改造部队，党派了干部来帮助你们。回去后要执行党的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教育国民党杂牌部队，坚持统一战线；要实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才能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陈毅的指示，极大地激励了部队的士气，为联抗以后的活动指明了方向。

(三)

根据华中局决定：划姜堰、海安运盐河以北，东台、溱潼大河以南，李堡、海安串场河以西地区为联抗部队活动地区（后包括海富区和李堡区）。在苏中第一、二、三地委之间成立兴东泰地委，它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并争取国民党的李明扬部、税警团和保三旅一同抗日，同时做争取伪军的工作。当时这一地区，除了范公堤以东部分原属苏中二分区的游击区，斗争面对着李堡、立发桥、海安、富安、安

丰和梁垛的日伪军。堤西部分，是日伪和国民党残余武装共同活动的地方。在联抗部队离开期间，税警团、保三旅伸入这一地区的中心，税警团由溱潼、姜堰地区伸入曲塘以北，保三旅由时堰伸入了仇湖、墩头地区，并曾袭击我留守部队。在这一不满六百平方里和十万人口的狭小地区，驻有各种各样的部队，收税要粮，再加上日伪军经常来烧杀抢掠，这一带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苦。当我们从盐阜地区沿途打回来的时候，老百姓带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说：“还是联抗回来好，以后不受张三旅的气了。”（保三旅的旅长叫张星炳）这就反映了老百姓对于联抗部队的怀念，也反映了这三四个月中，张三旅和这一带老百姓的关系是很坏的。我们回来后，经过了解情况，考虑到要站得住脚，首先必须把张三旅赶到大河以北，同时要取得税警团的合作，争取税警团仍回到姜堰以北，争取一个短暂时期的和平，以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政权，解决粮食与冬季服装。因此，我们决定首先恢复同李明扬和税警团的关系，便于我们集中力量对付张三旅。这时候，李明扬和税警团由于同新四军苏中军区的部队发生了一些小磨擦，怕新四军对他们报复，一听说我部回来，他们的代表就到了，邀我们在邓高庄会谈。我们先后在邓高庄和兴化茅山作了两次会谈，参加的人有李明扬、税警团的代表和我，还有苏中新四军的代表朱克靖。他们都重申了与我联合抗日的愿望，但他们诉说了部队多，地区小，国民党不发军费等等困难，要求通过我请新四军给以援助，暂不想退还所占我部及苏中一分区的某些地区。我们当时为了争取他们，只表示仍和从前一样联合抗日，对于地区问题没有作肯定的答复。随即，在取得上级同意之后，允许他们的部队留在原驻地区，但要保证不破坏我们的

群众工作，不欺侮老百姓。由联抗部队给他们以经济援助，并允许他们在日军大举“扫荡”时，可转移到我地区及苏中其它地区。李明扬和税警团都表示满意。此外，我们在军事上也商定交换情报。这样做，在群众中也有良好影响。于是，我们就集中力量解决顽固派张三旅的问题，我们还是采取团结的方针，先派人送信给张三旅，要他们派人来谈判。他们置之不理，相反日夜派少数部队进入我区抢掠、骚扰，并加强墩头的防御工事。经多次劝告不听，我们忍无可忍，在苏中三分区部队援助之下，展开了对张三旅的反击，歼灭其主力一部，他们被迫撤出墩头，以后他们不敢再向南发展。我们开展了对时堰区和仇湖区的根据地工作。这样来自北面顽军的威胁减少了。接着，我们又通过李明扬、韩紫石和其他地方士绅，开展了对伪军的政治攻势。这些伪军包括了原鲁苏皖部队、税警团和各个保安旅的成分，他们的战斗力原来就很弱，普遍害怕新四军，想和新四军建立一定的联系。以求得当时不挨打、将来可以有个反正的机会。我们就充分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向他们展开攻势，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据点附近，要他们保证不下乡抢掠，定时送日伪活动的情报，保证我们的人员包括情报人员、收税人员和采购人员以及抗日军属在据点和据点附近的安全，并代我们购买药物和军用器材等等。我们也担保新四军不进攻据点。这一攻势是有效果的，我们少数被俘的人员被释放回来，还保护了我们的交通线，特别是由于我们的情报人员深入到日伪内部，掌握了日伪军的动向，因而在我们这狭小的地区内，取得了军事活动的主动权。同时对于整个苏中地区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当时苏中军区特别重视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地区有一个时候，曾成为苏中获得日伪及国民党军

队情报的中心。我们通过和国民党军队的谈判，对伪军的政治攻势，取得了这一地区暂时安定的局面。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与建设武装。1942年苏中各分区都遭受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只有联抗地区比较安定。有了这一年的休整，军队、政权、党群工作都有了不少进展，这一地区就是利用日伪顽的矛盾交错，在斗争当中日益巩固起来的。

(四)

1943年是联抗成立以来最紧张的一年，敌伪在苏中大举“清乡”、“清剿”，联抗地区也遭到“扫荡”。伪军在我区中心王家庄、墩头等地都建立了据点，我们这一不满六百平方公里的地区，除顽军外，日伪军大小据点多至六十余个，在我区的中部各有一条公路和大河，日夜行驶着日伪的汽车和汽艇。我们活动的范围，非常狭窄，我军驻地距敌人据点最远的地方不足十里，敌人一个跑步就能打到我们门口，因而大部队无法行动，经常是分散为一个营、一个连的活动。有时为了安全，在群众掩护下，干脆驻到敌伪碉堡附近。由于对伪军工作有基础，情报灵通迅速，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确定每日的行动。有时选择敌人的弱点打伏击，对于不遵守诺言、对我骚扰的伪军，则给予打击，取得小胜利以激励士气。就是这样，我们仍然感到机关太大，行动不便，于是执行了中央精简的指示，实行精兵简政，使部队更灵活一些。

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里，联抗坚持执行党关于团结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指示，给友军以经济上的援助，把我获得的日伪军“扫荡”的情报及时通知他们，欢迎他们在反“扫荡”的时候向

我地区转移。尽管这些部队的首脑人物已经不想抗日，但只要他们没有公开投敌，我们就继续给他们以支援，这样做，是会获得他们当中进步官兵的拥护的。就是对于最顽固的张三旅，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对他们的争取。

1943年春，正是日伪军大举“扫荡”泰、东、兴地区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联抗军司令部正隐蔽在曲北吉庄乡，张三旅被日军打垮了。张三旅的副旅长胥金城多次派人来联系，要求参加新四军或联抗。他说：“我知道新四军和联抗都是真心抗日的，我冒着生命危险来找你们，愿意跟着你们继续抗日，请你们收留我。”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和感动的事情。我们和张三旅打了一年多的仗，但是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胥金城毅然走上了坚决抗日的道路。当时，张三旅旅长张星炳弃军逃跑了，我们派人帮助胥金城收容了旧部，并报苏中军区委任他为兴化第七纵队司令，他率领旧部七百余入赴兴化驻茅山地区，不久，他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日伪“扫荡”的前夕，就把情报送给税警团，要他们提高警惕。他们这时还有部队四千余人，武装很整齐。我们要他们将部队分散，化整为零，以便进行反“扫荡”的战斗。他们没有接受我们的忠告。结果，敌伪大举“扫荡”开始后，他们因没有准备，遭到突然袭击，总指挥陈泰运在慌乱中率少数人逃跑了，军中一度失去了指挥。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副总指挥林叙彝在进步军官陈振、李浩的鼓动下，求助于我。我们除了给以经济的支援外，还建议他们迅即将部队转移至新四军苏中地区休整。他们经过考虑后，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同意立即转移。当晚，我率一部分精锐部队，带领他们全军向苏中二分区三仓河

转移。在我部掩护下，冲过了封锁线，这个部队从来不习惯于长途行军，六十里的行程，整整走了一夜多，虽然感到疲劳，但总算到达暂时比较安全的地方。到达后，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和慰劳。军区和专署也来电鼓励。他们中原来受过反共宣传的官兵，都十分感动地说：“新四军不是外人。”就这样，这个部队在当地和平整训时，一切给养都由新四军供应。在此期间，我们又对他们的军官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当时该部进步军官曾考虑过与联抗合并，但最后没有实现，两个月后，仍由我率一部分部队护送他们回到原地区。不久，逃跑的总指挥又跑回来了，他不但不感激我们对他们的支援，相反还怀疑这个部队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将会发生变化，遂设法将进步的军官弄走，军权便落到一贯反共的军官手中，于是税警团与联抗部队的频繁磨擦的局面便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小规模战斗，日日夜夜的枪声、手榴弹声几乎不断，原来的友军变成了敌人。

尽管我们再三争取他们停止反共的行动，并警告他们：反共的前途必然是要投敌的。可是他们拒绝和我们谈判，破坏我们的政权，逮捕和枪杀我们的干部，甚至把迫击炮对准我们的司令部发射，达到使人难以容忍的程度。为了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并不是软弱可欺的，必须给他们一点教训，进行争取工作才有可能。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军区，并建议采用先打击再争取的方针，军区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但考虑我们当时的兵力有限，不能保证胜利完成这一任务，决定将原在通海地区活动的汤景延团编为联抗二团，并任命汤景延任联抗副司令员。1944年春节前，在弄清敌情之后，我们选择了一个黑夜，分别对税警团在邓高庄、校林乡和马家甸的驻军进行袭击，消灭其一个营，俘获了百余人，剩下大